

近些年，西藏“内地班”和新疆“内高班”学生在内地完成高中学习后，绝大部分顺利考入内地大学学习。但据了解，这些进入内地大学就读的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大学生的所学专业（如船舶设计制造、海洋生物学）不一定适合回到藏区或新疆就业。有些一心想回西藏就业的西藏籍大学生在校并没有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而是积极准备回到西藏报考公务员。同时所在学校也不希望这些藏族学生留级或肄业，因此多采取降低要求的做法以保障这些学生顺利毕业。这实际上使得学生本人的宝贵学习光阴、所在大学的教育资源、政府提供的各项补助等被白白浪费，这种局面应尽可能避免。如果换一个思路，我们转而鼓励那些在大学所学专业并不适宜返乡就业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毕业后留在内地专业对口的岗位就业，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此外，这些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内地城市就业和居住，不仅可以使这些学生所学专业知识发挥作用，同时对于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可起到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样的就业策略实际上拓展了藏族、维吾尔族学生入学时的专业选择范围，有助于改善藏族、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新一代知识分子就业领域的整体结构，增加少数民族在各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与此同时，这样的就业思路可以逐步改变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就业地点分布，有利于扩展我国藏族、维吾尔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居住分布范围，促进我国各民族人口的跨地域均匀分布。少数民族青年的专业结构均布和职业行业均布是各民族人口地理均布的重要条件。

## 结语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国 56 个民族和 13 亿国民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历史上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现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全面参与祖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从而掌握现代知识体系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大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国家精英，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就业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 参考书目：

- 马戎，2012a，《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 马戎，2012b，“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10 卷第 3 期，第 136-156 页。
- 马戎，2013，“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 尼玛顿珠，2016，“多元文化教育视角下的内地西藏班”，马戎主编，《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 290-344 页。
- 欧登草娃，2016，“他们如何在上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马戎主编，《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 149-166 页。

## 【论 文】

### 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



# 以天祝县为例<sup>1</sup>

王浩宇<sup>2</sup>

**摘要:** 在民族语言使用衰微地区, 少数民族内部存在一种特殊的分层现象。天祝藏族自治县的个案研究表明, 语言习得与使用能力的差异维系并再生产了一种社会结构。对于缺乏优质语言教育资源的少数民族个体而言, 在升学和择业过程中不具优势, 致使其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当前, 加大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积极发挥语言在脱贫攻坚中的“造血”功能, 是促进少数民族全面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的基础性条件。充分挖掘民族语言的社会经济价值、营造少数民族青少年积极学习本族语的氛围, 也是语言扶贫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 语言能力; 教育分化; 社会经济地位; 民族语言; 国家通用语

语言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工具。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及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 个体的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等已联系得更为紧密。在广大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背景下, 解决好语言问题不仅是推动少数民族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同时也是扶智和扶志的有效工具, 对推动各少数民族群体实现共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为例, 结合当地语言环境, 从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经济收入、职业发展等视角呈现藏族青年一代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并借此讨论加强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和保护民族语言的发展对于全面提升个人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的重大意义。

## 一、天祝县藏族语言使用情况

天祝县位于甘肃省武威地区南部,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天祝县现有藏族、汉族、土族、回族、蒙古族等 22 个民族, 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语言转用和语言兼用是近些年天祝县社会变迁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从语言使用能力来看, 无论是生活在县城的藏族居民, 还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牧民, 大多数都能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社会交际; 但已有部分藏族受访者不会藏语或藏语使用不熟练(具体数据见表 1)。从语言使用的范围和频率来看, 藏语在天祝县使用范围较小、使用频率较低; 国家通用语使用范围广, 使用频率较高。在当地整体语言环境中, 国家通用语是强势语言<sup>3</sup>, 藏语仅在寺院、牧区的藏族家庭等特殊语域中被经常使用。

<sup>1</sup> 本文刊载于《语言战略研究》2019 年第 1 期。

<sup>2</sup>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

<sup>3</sup> 戴庆厦曾指出, 使用“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的名称, 是为了区分语言功能的大小, 这是属于语言社会学的概念, 与语言结构特点的差异无关, 因而丝毫不含有轻视弱势语言的意味。不同语言的内部结构, 各有自己的特点, 也各有自己的演变规律, 这是由各自语言机制系统的特点决定的, 不存在“弱势”和“强势”的差异。



表1、不同时期天祝县牧民语言使用能力对比<sup>1</sup>

语言	时间	懂 (%)	略懂 (%)	不懂 (%)	合计 (%)
藏语	1988 年	100	0	0	100
	2015 年	64.2	24.5	11.3	100
国家通用语	1988 年	59.3	29.6	11.1	100
	2015 年	94.3	5.7	0	100

语言态度是影响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从使用价值来看，多数天祝藏族受访者认为在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国家通用语的使用价值更高，而藏语则在节庆活动、传统仪式方面具有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语言威望评价来看，多数受访者认为藏语更具威望。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人群主要由藏族中老年构成，已有相当数量的藏族青少年认为使用国家通用语会“显得更有身份”。从情感价值来看，大多数藏族成员依然具有较强的“母语情结”，并对当前的语言转用现象感到惋惜和遗憾。不过，也有一些藏族受访者对语言转用持支持态度，认为学习与使用国家通用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调查数据见表 2。

表 2、天祝县藏族居民语言态度调查<sup>2</sup>

语言	使用价值评价	威望评价	情感价值评价
藏语 (%)	22.4	52.8	66.3
国家通用语 (%)	70.7	38.6	32.3
其他 (%)	6.9	8.6	1.4
合计 (%)	100	100	100

注：“其他”包括“说不清”、土语、英语等。

另外，与其他民族地区类似，天祝县藏族的语言使用也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现象。整体而言，人口流动、族际通婚、民族交融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强化当地藏族转用或兼用国家通用语。未来，藏语在天祝县的传承与发展将面临诸多考验，在语言使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如何维系多语并存并用的发展局面是需要人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

## 二、语言教育分化与家庭背景的结构性差异

当前，语言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天祝县藏族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比起本族语，当地大多数藏族青年更加倾向于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使用。虽然藏族成员非常支持本民族语言的发展，但受到升学、就业等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多数人首先认为学好国家通用语才是未来实现向上流动的基础性条件。

### (一) 天祝县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sup>3</sup>藏族学生生源情况对比

天祝县民族中学在校学生总数 523 人，少数民族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99%（主要为藏族），

<sup>1</sup> 表 1 中 1998 年调查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的科研人员于 1986-1988 年期间对当时全国 5 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113 个自治县（旗）和 15 个少数民族居住的省所进行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其中天祝县所选调查点为“牧区”，调查对象为“牧民”，样本量不详。2015 年数据源于笔者年在天祝县的田野工作，田野点分别为：西大滩乡、天堂乡、抓喜秀龙乡，调查对象为当地的藏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收集数据（主要参考年龄因素进行分层），有效样本量 N=466。本文选择天祝县抓喜秀龙乡（天祝县藏族聚居区之一，当地最大的牧区）的语言数据（N=97）与 1988 年数据进行比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指标设置与抽样方式的不同，这一资料对比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误差。参见王浩宇、何俊芳，“天祝县藏族居民语言使用现状调查与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 年第 5 期。

<sup>2</sup> 表 2 中语言态度调查有效样本量 N=369，由于抓喜秀龙乡属于牧区，语言使用情况较为特殊，故关于语言态度的分析仅采用西大滩乡和天堂乡的调查数据。数据采集方式与表 1 数据一致。其中，语言使用价值评价、语言威望评价、语言情感价值评价的测量问题分别为“在日常生活中，哪种语言对你来说最有用”，“使用哪种语言让你感觉自己最有身份”，“平时听到哪种语言让你感到最亲切”。

<sup>3</sup> 天祝一中是当地教育质量最好的普通中学。



教学方式主要以国家通用语授课为主，加授藏语文和英语。研究人员从民族中学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抽取了部分藏族学生，与天祝一中藏族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对比。<sup>1</sup>

### 1、生源地

民族中学多数被调查的藏族学生来自天祝县牧区，还有的来自于农区，生源地为天祝县县城的学生数量极少，与天祝一中形成鲜明对比。民族中学受访者共 88 人，家庭住址为牧区、农区和县城的分别有 78 人、7 人和 3 人；天祝一中受访者共 38 人，家庭住址为牧区、农区和县城的分别有 1 人、9 人和 28 人。

### 2. 父亲职业

从被调查学生父亲的职业来看，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两所学校的情况也有较大的差异。在 88 名民族中学的受访者中，父亲职业为牧民、农民以及从事运输、建筑、餐饮等行业的务工人员分别有 49 人、16 人和 19 人，个体户和公务员各 2 人；在 38 名天祝一中的受访者中，父亲职业为牧民、农民以及务工人员 and 从事运输、建筑、餐饮等行业的务工人员仅有 1 人、6 人和 8 人，剩余分别为公务员 10 人、教师 5 人、医生 2 人、个体户 6 人。

#### (二) 天祝藏族学生教育模式的类型分析

从民族中学藏族学生的教育背景来看，其升学模式普遍具有相似性。在小学阶段，牧区或者农区的藏族学生就读于当地的双语小学，毕业之后大部分学生进入县城的民族中学读书，包括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牧区双语小学的藏族学生考入天祝一中的难度较高，仅有极个别学生能够依靠特殊关系进入天祝一中或天祝二中等普通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绝大多数学生升入民族中学的高中部。结合相关调查资料，可以将民族中学和天祝一中藏族学生的教育模式划分为 3 种类型。

#### 1. 教育分化的 3 类模式

场域和惯习与文化资本的获得和积累密切相关。场域界定社会背景的结构，而惯习则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运作的。惯习首先是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构，同时也是一种习惯性的状态，其来自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外在的结构被此种经验所内化 (Bourdieu, 1977a)。同一阶层的个体在惯习上具有结构上的“亲和性”，表现为实践活动的一致或相似。惯习一方面限定了行为的方式或倾向，另一方面也产生出与早期社会化特征对应的洞察力、抱负以及实践 (Swartz, 1977)。借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天祝县牧区的藏族学生受到惯习和场域的影响，其父母所处社会阶层、生长地域及家庭收入等都会对文化资本的获取产生影响。而文化资本的存在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文化界限，下层社会的个体缺少上层社会所拥有的教育资本，从而促使下层社会的个体在特定场域中进一步强化其固有的惯习特征 (Bourdieu, 1977b)。语言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与个人的教育和成长轨迹密切相关，并由此再生产出一种结构性的关系。天祝县藏族学生教育分化具体模式见表 3)。

表 3、天祝县藏族学生教育分化模式

类型	I 类	II 类	III 类
生活地域	县城	部分乡镇或农区	牧区或部分农区
父亲职业	公务员、教师、医生等	村干部、个体户等	牧民、农民
就读中学	天祝一中、天祝二中	天祝二中、新华中学	民族中学
就读大学	重点或二本院校	专科学校或二本院校	专科院校或没读大学 (高中毕业或辍学)
个人发展	上升渠道多元化	上升渠道较为单一	外出打工、本地待业

注：该表格只做类型学上的划分以说明相关问题，并不适用于所有个案。

<sup>1</sup> 民族中学样本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在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各抽取一个班级而获得；由于天祝一中藏族学生数量较少，样本通过偶遇抽样、滚雪球抽样，以及学校教师推荐访谈等方式而获得。





关于天祝县牧区藏族学生的升学问题，一位藏族家长在受访过程中是这样描述的：

民中学生的家长都是牧民，他过去也不懂，就知道娃娃要学藏语，学好藏语将来升学不费劲。现在很多家长也知道了，要学好汉语<sup>1</sup>才好找工作，出去以后都是汉语，天祝这地方也是一样。但是牧民家的孩子也考不上（天祝）一中，娃娃藏语学出来，只能去上民中。（受访者：男，藏族，48岁）

## 2. 近年来民族中学学生、教师数量及重点院校录取率变化情况

伴随着天祝县语言环境的变化，近些年民族中学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导致优秀教师的离职及教育质量的下滑：

过去我们在乡上（访谈人来自抓喜秀龙乡），给民中输送（学生）的时候，全县（第）一、（第）二名的学生都有，现在“民考汉”干脆一个（都）考不上，“民考民”也不行，考藏文（“民考民”）连500分的学生都没有，他（们）的数学、汉语各方面都不行。学校发展不好，好的老师都走了。（受访者：男，藏族，51岁）

实际上，自2010年起，民族中学的学生与教师数量就已经开始减少，重点院校的录取率也基本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具体数据见表4。

表4、民族中学学生数量、教师数量与重点院校录取率

时间（年）	学生数量（人）	教师数量（人）	重点院校录取率（%）
2010	1030	141	0
2011	802	140	0
2012	740	139	2.3
2013	647	135	0.5
2014	591	130	1.0
2015	532	129	0
2016	523	126	0.4

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天祝藏区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早，语言环境和人们的教育观念随之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追求语言工具价值的倾向也已成为影响人们思考语言使用与传承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藏族学生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家通用语的学习上，主要是因为社会就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基于未来的个人发展与社会流动而做出的考量：

天祝这个地方和兰州、武威这些城市接近，很早这个地方的高速就通了，那我们看到人家的孩子都考清华和北大，我们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念呀，那怎么办，考这些学校要学英语的，那就去上普通高中。现在都一个娃娃，娃娃学（藏语）出来没办法，民中也不是一朝一夕变成这个样子的。（受访者：男，藏族，36岁）

## 三、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分层

语言能力不仅在语言交换中养成，也依靠学校教育的培养。掌握不同经济资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产生出不同的语言能力（高宣扬，2005: 304）。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职业声望、社会资本的获取等密切相关，是考察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

### （一）民族中学藏族学生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

对于民族中学的藏族学生而言，其国家通用语和英语水平不及普通中学的汉族学生和藏族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语言优势；多年的藏语学习效果似乎也并不理想，藏语使用能力较差，

<sup>1</sup> 马戎等国内学者提出，“汉语”一词的提法并不准确，容易引起误读，建议使用“国家通用语”之称。



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藏族学生的语言态度。

### 1. 语言能力

研究人员在民族中学高中部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调查校内藏族学生关于国家通用语和藏语的使用能力，见表 5。

表 5、民族中学藏族学生语言使用能力 (N=260)

语言	能熟练交谈 (%)	能交谈, 不熟练 (%)	能听懂, 但不会说 (%)	听不懂 (%)
藏语	11.1	17.7	66.1	5.1
国家通用语	96.9	2.3	0.8	0

表 5 样本数据显示, 几乎所有的藏族学生都能比较熟练地使用国家通用语, 但能够熟练使用藏语的人数仅占样本量的 11.1%, 大多数藏族学生属于“会听不会说”的类型。调查发现, 藏族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基本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交流, 部分声称自己“会藏语”的学生在交际中仅能讲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 2. 语言态度

语言是一种集体化的公共产品, 为人们提供沟通的渠道, 因而其生命在于使用。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 选择一种标准、网络或语言就是一种投资, 一种语言越有价值, 它的寿命就越长, 它的使用者就越多 (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 102)。所以, 语言与其他大多数商品所表现出的“物以稀为贵”的价值特性不同——“网络效应”促使语言的工具体价值随着使用人数、规模、范围等增多或增大而不断获得提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民族中学藏族学生的语言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见表 6。

表 6、民族中学藏族学生语言态度 (N=260)

语言 比例 (%)	在日常生活中, 哪种语言对你来说最有用?			
	藏语	国家通用语	英语	其他
	36.9	54.6	5.4	3.1

表 6 数据显示, 民族中学仅有 36.9% 的藏族学生认同本族语的使用价值。实际上, 调查数据并没有客观反映当前藏族学生真实的语言态度。由于藏语在当地社会的使用范围小、使用频率低, 加之媒体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 部分学生对藏语学习持排斥态度。从整体上看, 民族中学藏族学生对本族语的使用能力不强, 转用国家通用语趋势明显, 其语言态度不利于藏语的习得和传承。

#### (二) 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藏族毕业生社会经济分层的个案呈现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资本, 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因而文化资本的差异能够影响社会经济的分层体系。教育分化及其语言教育资源的配置差异, 导致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藏族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 特别是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具有较大的差异。<sup>1</sup> 语言能力的差异未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藏族青年一代的职业发展、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

#### 1. 个案调查情况

本研究对当地 20 位从民族中学和天祝一中毕业 5~10 年间的藏族学生进行个案调查, 主要采用实地访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 其语言能力、升学与就业、经济收入情况见表 7。

<sup>1</sup>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天祝县藏族兼用或转用国家通用语的时间较早, 相比于其他藏区, 当地藏族青少年的国家通用语水平整体较高 (就国家通用语而言, 无论是民族中学, 还是天祝一中的藏族毕业生都声称自己具有较强的使用能力)。但是, 根据当地中学教师的介绍, 实际上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的语文教学质量差距较大, 两校之间藏族学生的语文成绩, 特别是写作能力与口语表达能力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表 7、天祝县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毕业生个案调查

编号	国家通用语/藏语水平	毕业学校	职业	年收入	备注
1	一般/弱	民族中学	个体户	约 5 万	在天祝县天堂寺附近开小卖铺
2	强/弱	民族中学	教师	约 5 万	天祝县西大滩乡小学
3	强/强	民族中学	学生	无	澳大利亚药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4	强/弱	民族中学	文员	不详	在天祝县县城某打印店工作
5	强/一般	民族中学	公务员	约 6 万	天祝县县政府
6	强/强	民族中学	教师	约 10 万	成都市某高校
7	强/强	民族中学	编辑	约 12 万	拉萨某出版社
8	一般/弱	民族中学	待业	无	在天祝县西大滩乡家中待业
9	一般/弱	民族中学	保安	约 2 万	天祝县某小区
10	强/弱	民族中学	服务员	约 3 万	武威市某火锅店
11	一般/弱	民族中学	文员	约 3 万	天祝县某传媒公司
12	强/一般	民族中学	技术员	约 5 万	武威市电视台
13	一般/弱	民族中学	司机	约 5 万	长途车司机
14	一般/一般	民族中学	个体户	约 4 万	在天堂寺附近经营小旅馆
15	强/不会	天祝一中	歌手	不详	主要在青海、甘肃等地表演
16	强/不会	天祝一中	创业	不详	在兰州从事药材生意
17	强/弱	天祝一中	学生	无	武汉某高校在读博士生
18	强/不会	天祝一中	公务员	不详	广州市某区政府
19	强/弱	天祝一中	教师	约 10 万	在兰州市从事音乐培训工作
20	强/强	天祝一中	公务员	约 10 万	上海市某政府机关

## 2. 个案信息呈现

表 7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语言使用能力、教育背景的差异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等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多数天祝一中毕业的藏族学生在省会城市就业，平均年收入与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多数民族中学毕业的藏族学生在天祝县或中小城市工作，平均年收入与职业地位相对较低。在天祝县藏族群体内部，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拥有更好的教育条件，从而获得良好的语言能力（这里主要指国家通用语的使用能力），甚至是获得更强的学习自信，进而在未来的职业选择和经济收入方面更具优势。

值得指出的是，表 7 数据还显示，3 号、6 号、7 号受访者虽然毕业于民族中学，但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中上层。调查得知，3 号受访者目前在澳大利亚某高校读药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藏药方面的研究；6 号、7 号受访者是姐妹关系，分别某大学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目前从事藏族社会研究和藏语编辑工作。另外，20 号受访者在上海某政府机关工作，平日所处理的主要事务与少数民族事务关系密切。上述受访者从事的工作都与传统藏文化和藏语文密切相关，从另一角度理解，正因为具备了较强的藏语文使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 （三）藏族青年一代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类型分析

基于上述田野材料，可将藏族青年一代的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划分为国家通用语单语、民族语单语和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双语 3 种模式进行考察。

#### 1. 国家通用语单语模式

由于语言是高度集体化商品，所以有可能出现这样的蜂拥现象：有些人为了获取这些商品挤进去，有些人则为了摆脱这些商品要冲出来。而当大家都蜂拥去学习一门中心语言时，其使用者越多，想要学习这门语言的人也就越多（博纳德·斯波斯基，2011:102）。受到天祝县整体语言环境的影响，与本族语相比，当地大多数藏族青年更加倾向于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使用。然而，掌握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差异与教育资源的获得密切相关，与教育相关的文化资本差异又会对社会分层的再生产发挥作用。在藏族青年内部，由于获得的语言教育资源的不同，国家通用语使



用能力强的藏族青年在升学、就业中更具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也更高；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较弱的藏族青年在升学、就业中均不占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一般或较低。

## 2. 民族语单语模式

除在牧区生活的个别藏族老人之外，目前天祝县并不存在藏语单语人的情况。当地藏民族成员普遍认为，拥有一定或较强的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不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准入条件，而且也是与他人交流、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就全国整体情况而言，仅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个体也无法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 3. 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双语模式

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双语模式是提升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社会经济地位的最有效模式。如表 7 个案信息所示，在具备良好的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基础上，熟练或比较熟练使用本族语也是促使少数民族青年能够在科学研究、文艺文化、行政管理等领域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在语言使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民族语言所能发挥的也不仅是基本的身份认同功能，同时还伴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另外，在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旅游开发和特色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民族语言发展的“长尾效应”值得人们关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语言作为一种任何人都有机会使用、存量却不会减少的社会财富，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基础性要素；另一方面，部分藏族青少年对于民族语言的忽视，也可能使其失去获得民族语言本身能够带来的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机会。

# 四、结语

在布迪厄看来，教育体系通过自己本身逻辑的简单运作就能确保永久的特权（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 2008：94）天祝县的个案研究表明，藏族青年一代的家庭背景与教育背景的差异对其语言能力强弱的影响较大，而语言能力本身又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与再生产了一种社会分层。语言知识和技能具有“元知识”“元技能”的属性，是个体获得其他知识和技能的重要基础，对大部分知识和技能，个体都必须通过其所掌握的语言技能来获得（王海兰 2018）。藏族精英家庭的子女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能够获得优质的语言教育资源，从而在就业环境中更具优势；但普通牧民家庭的子女由于无法获得优质的语言教育资源，致使其在未来的升学就业、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等方面均不占优势。

加大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促进少数民族青年一代学好国家通用语，是推动其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础性条件。即使在保护多元文化的社会体系中，少数民族实现社会流动仍然需要学习某种强势语言（Bourhis, 2001：36）。今天的汉语文作为中国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马戎，2016）。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是提升个人素质、增强竞争力、全面参与现代化进程的语言基础。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而言，获取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所需的教育权利，特别是优势语言的教育权利，也是基于能在广大社会中获得机会并主动参与的需要（詹姆斯·托尔夫森，2014：68~70）。在当前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帮助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获得良好的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更是推动脱贫攻坚从“输血”走向“造血”之路的必要条件。

语言扶贫工作也要保护好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在语言工具主义看来，保持多语或双语是重要的，特别需要重视强势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的经济价值（詹姆斯·托尔夫森，2014：175）。从事实上看，民族语言能够为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增强其在创新创业、组织管理，甚至是国际交流方面的能力。“双语”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人发展具有正面影响。同时，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从语言与文化、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语言多样化程度的降低会减少我们可以汲取的知识源泉，从而降低人类的适应能力（苏·赖特，2012：214）。





当前，营造少数民族青少年积极学习本族语的氛围，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举措。

### 参考文献：

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宣扬 2005 《当代社会学理论（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 2008 《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第六版）》，刘少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戎 2016 《汉语的功能转型、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苏·赖特 2012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海兰 2018 《语言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第2期。

詹姆斯·托尔夫森 2014 《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第二版）》，俞玮奇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Bourdieu, P. 1977.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his, R. 2001. “Acculturation,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in J. Klatter Folmer and P. Avermaet. *Theories on Maintenance and Loss of Minority Language*. Munster: Waxmann.

Swartz, David. 1997. *Culture &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报刊文章】

### 中国的大西北问题

《联合早报》2019年4月9日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90409-947054>

郑永年（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近来面临全方位的国际环境变化，涵盖了经济贸易（如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国防安全（如台湾、南中国海和朝鲜）和内部稳定和安全（如新疆问题）。新疆问题尤其突出，似乎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是政府、非政府组织还是媒体），就中国政府处理新疆问题的方法提出质疑、挑战和挑衅。

实际上，新疆问题不止局限于新疆，而只是中国大西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疆问题自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政府不得不下大决心来控制局面和解决问题的程度了。尽管没有多少人会否认解决新疆问题的重要性，但解决问题的方式极其重要。

如何解决问题？这首先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峻局面。从问题产生和恶化的路径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式。新疆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造成这些变化有诸多根源，但如下几个是很显然的。

